

反“话语拜物教”：符号学对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审思*

陈文斌

摘要：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将话语视为意义世界的源头，建构出“话语拜物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暴露出唯心主义的弊端。本文沿着索绪尔、巴赫金、福柯、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发展脉络，探寻话语拜物教形成的历史轨迹，并从符号学维度对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进行审思和批判。最后展望话语理论的新发展，以鲍勃·杰索普的文化政治经济学为典型，以“经济构想”和“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两个概念为案例，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接受文化转向后，话语理论将得到新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话语 拜物教 符号学 文化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种开放体现在内外两个维度。就自身而言，马克思主义有着自我批判的精神内核，在理论建构中，马克思本人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及其界定就进行过再反思。比如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马克思最初认为，“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①但是，在随后的分析中，他更为严谨地指认：“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来说，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②这意味着，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在交换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没有固守概念限定，而是直面自己思想的推进，服从真理，从而让已言说的内容不断接受检验，展示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中期成果之一。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6页。

自己思想体系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系统，不仅自我内部开放，也向外部理论打开边界。马克思主义可以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思潮相结合，这也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路径。同样的，后马克思主义也试图利用这种开放性，去改进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社会分析模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被后马克思主义视为本质主义与中心主义的表征，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认为社会由话语构成，试图消弭政治、经济之间的界限。但这样的做法实质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圈套，无助于审视新的社会状况。

一、话语与意义

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认为现实的物客观存在，意识的形成建基于物质基础。而后马克思主义则提出话语理论，将话语视为意义世界的源头。话语理论试图用“存在”和“实存”的划分去躲避唯物主义的指摘。

物的“实存”即客观的物的确存在，但存在本身对我们而言并没有意义。物的“存在”依赖于话语，只有在话语之内，客体才能被我们赋予意义。也就是说，意义本身是话语赋予的，脱离了话语，物的“实存”毫无意义。但这里又导出了两个审思：第一个问题是“实存”的客体，其意义是指向谁的？第二个问题是“存在”的客体，其意义又是谁赋予的？

以上两个审思，实际上触及了话语的主体问题。第一个问题：难道“实存”的客体只有对人有意义才是真的有意义吗？按照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说法，话语即人类的话语，只有话语才能赋予客体以意义，这实际上暴露了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潜藏的价值预设直接排斥了自然世界的意义存在，而事实是“由于物种之间的感知器官、方式和范围不尽相同，在同一个实际世界中，不同的生命体建造出了不同的主体世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彼此相异的意义世界”^①。这意味着，不同的生命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主体特性去建构意义，这一意义并非人类赋予，而是生物体自身所需要和追寻的。生态符号学的融通视域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幻象，同时也批判了话语理论将意义接受者狭隘化的做法。虽然拉克劳辩称：“自然事实也是话语事实……把

^① 彭佳：《文化对自然的模塑——一个生态符号学模式的提出》，《哲学与文化》，2015年第8期，第149页。

某物称为一个自然对象，就是某种思考它的方式，即该物是建立在分类系统的基础之上。”^① 这样的解释实际上还是在强调存在都是话语言说的结果，仍旧在话语的圈子里打转，没有摆脱话语，去认可物质世界本身对其他物种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赋予客体以意义的主体在哪里？拉克劳的话语理论将这一主体隐藏，预设了一个必然存在且不必现身的主体，这个主体犹如上帝一般，它的神秘化实际上是建构者的一种策略，一旦言说清楚就不再为人所迷信。拉克劳与墨菲认为：“每一个客体是作为话语的客体来构造的，这意味着所有的客体都是通过或者凭借话语来给出它们自身的存在；这就是说，不存在先于话语的客观性和实在性，客体如果不被言说，不被写作或不被思考，就不存在。”^② 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如果不存在先于话语的客观性和实在性，那话语就具有了先在性，然而话语本身又是被言说的，总是存在一个发送者，而这个发送者的客观性和实在性又是不存在的。换言之，话语根源于一个言说它、写作它、思考它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又无法先于话语存在。

这里涉及的不仅是逻辑上的先后关系，而是主体何以存在的问题。拉克劳和墨菲从马克思那里借来了“社会关系”这一概念，试图以此解释意义产生的根源，从而摆脱对主体的追溯。他们举例论证：“一个对象成为足球的前提是：只有在它和其他对象之间建立起了关系系统，且这些关系并非仅仅由对象实指的物质性所赋予的，而是由社会所建构的。这一关系系统就是我们所谓的话语。”^③ 这个例子试图辩解，足球之所以是足球，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建构，而不是单凭其物质性。赋予足球以意义的不是某个确定的实体，而是社会关系。

为了避免主体缺失的尴尬，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套用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 到了拉克劳这里，话语的本质套用了人的本质，话语成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对象都是在这一关系中被建构的，进而又可推导出：“正是话语构成了社会行为为主体的主体身份，所以，社会行

① 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4页。

② Norman Geras, "Post-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987, 163, p. 66.

③ 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④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为主体不是话语的源泉。”^① 通过这样的推导，主体就被抛弃了。

凭借着这样的逻辑转换，话语自身成为主体，它不需要其他主体再去赋予它意义。人们也不需要去探究话语的创造者，因为话语创造了自身，与造物主一样，自我笼罩了神秘的面纱。处于后现代文化中的社会行动主体，都成为话语建构的对象。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全部被消解为“话语构成”，“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所有组成部分都漂浮在失重的真空中，漂浮在话语的构成里”^②。话语理论一方面想要摆脱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构成的分析模式，另一方面在摆脱过程中又不得不借助马克思主义来掩盖自身的逻辑漏洞。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却又建构起了话语拜物教。话语成为无所不能的建构力量，甚至能够建构自身。

“作为原始宗教信仰之一，拜物教是指在神灵观念尚未产生以前，一些原始部族把某些特定的物体当作具有超自然能力的活物而加以崇拜。”^③ 这是拜物教的源头。现如今的宗教仍旧为信徒提供追寻意义的生命动力，追寻本身还兼顾了现实世界的物质性基础，而在话语拜物教那里，物质世界的实存虽然得到承认，但实存客体从人类的意义世界中被刨除出去。就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话语建构了我们和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这样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性的社会不存在，社会就是话语，话语就是社会，社会是通过话语建构的。话语的偶然、不确定、多元、碎片化特征就是社会的特征。”^④

“话语概念认为社会上任何事物都是不固定的”^⑤，这样的论断迎合了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反本质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此，意义也是被话语建构的，这样的结论与符号学本身对于意义的分析有类同之处——话语理论和符号学都指出，意义本身是被阐释出来的。不同之处在于，符号学将意义的生成置于符号过程中，发送者、文本、接收者，都是符号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话语理论不去考虑，甚至是不承认发送者的意图意义，以及符号信息所携带的文本意义。既然“话语之外无存在”，发送者、对象与接收者之间的地位

① 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② Albert Bergesen, "The Rise of Semiotic Maxism",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1993, 36 (1), p. 14.

③ 刘召峰：《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考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第17页。

④ 付文忠：《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6页。

⑤ Ernesto Laclau, "Metaphor and Social Antagonisms". In C. Nelson and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p. 254.

就不再对等，换言之，发送者和对象之所以能够存在还是依赖于解释者。客观世界变成了主观世界，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后现代新型的唯心主义。

二、反“话语拜物教”：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共同立场

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力量，却又采取对抗的姿态，而符号学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话语理论在区分了“实在”与“存在”后，将“存在”视为历史的、变化的，而“实存”则是没有历史且不会变化的。人类历史的确是由话语建构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海登·怀特将历史视为话语的操演，认为历史学家像小说家一样叙述历史，历史意义的凸显也依赖于历史学家的叙述方式。

话语理论的确具有强烈的解构效应。历史由话语建构，这一点本身并没有错，但将这一点推向历史虚无主义，就走向了极端。为了避免这种极端，需要对历史进行分层。原初的历史与再现的历史必然不同：原初的历史即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处于过去时；不论是语言还是文字去叙述的历史，只能是符号再现的历史。新历史主义强调话语操演的历史，指的是符号再现对于原初的变异，这种变异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为历史已经不在场，所以才需要符号来再现意义。

反过来思考，不在场的历史本身就没有意义了吗？实际上，它仍旧是有意义的，只是这个意义没有被言说出来，或者没有被普罗大众所接收到。该问题指向了话语权，话语之所以能够被建构甚至传播出去，都是凭借着话语权的推动。官方公布的历史有政治效力，掌握资本者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传播话语的平台，当然，资本本身又可以分为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所提出的话语，是被权力渗透的话语，我们能够看到或听到的历史是被话语权传达出来的历史。因此，话语自身也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从潜在话语到显在话语的过程，潜在话语没有话语权的支撑，只能在个体间彰显，显在话语凭借着权力取得了定名和地位。

厘清了话语背后的权力问题，再去反观历史，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话语是历史中的话语，没有历史就没有话语。这就将后马克思主义颠倒的逻辑顺序翻转了过来：历史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话语是历史的产物，只不过这一产物在反观起源时，误认了自己。

这种误认有着理论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发展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到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最后在拉克劳、墨菲那里变成了话语拜物教。话语理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去主体化、去历史化的倾向。

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立足于一系列二元划分,具体言语背后的语言成为关注的焦点,结构上的对应确立了话语分析的科学性。当索绪尔把人类话语作为对象进行共时性分析时,能指与所指构建了符号的意义机制,而这一机制背后的任意性原则为后现代话语理论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埋下了伏笔。索绪尔语言学最初的共时性分析,在避开历时性分析的复杂性时,也先天地搁置了历史因素对话语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轻视历史,甚至将话语凌驾于历史之上的观念,可以在索绪尔那里找到影子。

作为符号学家的巴赫金打破了话语研究的封闭性,将话语置于主体交往与对话之中,由此,社会性及历史性的维度被纳入话语分析。话语在巴赫金那里具有对话的性质,对话则引出了话语言说的主体,而这些主体又处于社会文化之中。因此,与索绪尔研究静态语言不同,巴赫金“把动态的语言——言语交际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①。话语又是属于具体个体的,这些个体承载着社会意识,在对话的网络中生发着话语的意义。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围绕两个要点展开:其一,话语是对话性的,不是独语;其二,话语依托于主体,不是自我生成。第二点是第一点的前提,只有言说主体的存在和确立才能保证对话的展开。但是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为了消解人这个中心,抹除了主体的痕迹。同时,为了保证后现代主义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话语理论无法去固守索绪尔的孤立静止,只能坚持对话关系的动态生成。无奈的是,主体的先在性被话语的先在性所取代,话语自身何以可能的条件被搁置了。

巴赫金话语理论的核心是话语的对话性,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是一致的。同时,这一话语理论“着重探究语言符号与意识、知识、权力、交往行为、交往关系及文明制度之间的勾连互动关系,其中尤为重要并意义重大的则是巴赫金所着力揭示的话语与意识形态问题”^②,这又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批判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超越了索绪尔,其理论上的创建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所吸收和改造,只是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巴赫金最初的意旨。

巴赫金关于“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③的论述,直接开启了福柯关于话语权力问题的分析福柯的话语理论强调话语对主

① 萧净宇、李尚德:《从哲学角度论“话语”——巴赫金语言哲学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136页。

② 李彬:《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及其对批判学派的贡献》,《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6期,第68页。

③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钱中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6页。

体及现实世界的建构作用。由巴赫金开启的话语的双向互动到了福柯这里又变成了单向建构：“话语最终决定了我们如何认识社会、文化和我们自身，决定了我们想什么和能看到什么。一句话，作为显示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意义，而是深蕴了隐而不现的强大建构力量。”^①

福柯话语理论的建构论为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提供了认识论上的支撑。同时，福柯将人的主体性地位下放，他“不相信存在自主独立的主体，而认为主体以一种自律或自觉的方式接受话语权力的训诫”^②。因此，笛卡尔开启的“我思，故我在”的反思主体变成了被权力规训和控制的无能主体，福柯甚至声称：“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③ 主体的消解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被视为反中心、反本质的必经之路。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正是顺应了这一思潮的价值立场，以偏离马克思主义为代价，去构筑话语拜物教，把话语视为无所不能，具有本源性的建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说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物质生产不同于话语生成，前者立足于主体的劳动实践，后者是不依赖于主体的建构力量。符号学同样强调物质的基础性地位，“符号是物质的不仅仅因为它的物理本性，还因为它在历史传统中，在特定文化中占有自己的位置——甚至所谓自然符号也不例外——而符号正是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获得了某个特定意义”^④。在坚守历史唯物主义这点上，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是保持战线统一的。不仅如此，对于商品和货币的分析，符号学的方法同样适用，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批判是一种有效的符号学分析”^⑤，两者都关注商品和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意义生成，都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与历史相关，并且意义会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因而，意义不是由话语构建出来的，而是在历史传统中，在社会关系中被主体建构出来的。

三、文化政治经济学

当代西方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始终相互羁绊着。一方面，作为思想宝

① 周宪：《福柯话语理论批判》，《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第124页。

② 冯月季：《从政治化到世俗化：意识形态的符号学转向》，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1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7页。

③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06页。

④ Augusto Ponzio, "The Semiotics of Karl Marx",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4, 10 (2), p. 203.

⑤ 苏珊·佩特丽莉，奥古斯都·庞奇奥《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张碧译，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7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7页。

库的马克思主义为后代理论的推进提供助力,比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某些理论家刻意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树起新的理论旗帜。比如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从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颠覆”^①。这两种路径实际上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正如德里达所言:“地球上的所有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②当然,符号学也不例外。

鲍勃·雅索普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PE)。这一理论“组合了诸多概念和方法,这些概念和方法来源于批判性符号学分析与批判性政治经济学”^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接受了文化转向,促成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在文化转向中,“不论依据怎样的理论、采取何种立场,也不论是否提出了对马克思的直接批评,不同的代表也都实际上从不同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元理论——例如从生产(生产方式)出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以经济解放为目标的历史使命、以阶级为中心的政治策略等等——提出了新的诉求和挑战,并形成了以文化批判为内容、以霸权为目标和以话语为中心的反权力知识实践。”^④可以说,文化政治经济学正是符号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的一种新尝试,这一尝试没有忽视经济政治的物质性基础,反对超历史的分析,反对割裂传统,强调意义与实践彼此联系的复杂性,强调社会关系的物质性,考虑到了主体与客体的共建,避免了用还原论的方法去分析现实问题。

文化转向,仍旧触及话语这一关键概念。文化政治经济学同样指出了话语的构建作用,但与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不同,鲍勃·雅索普将去主体化、去历史化的话语重新拉回到符号学维度,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轨道上。重回马克思意味着,“文化政治经济学包含了一个批判的、自我反思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方法,以及它所主张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语境

① 张碧:《评佩特丽莉与庞奇奥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见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第7辑),四川大学出版社,第180页

②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③ Bob Jessop, “Critical Semiotics Analysis an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04, 1 (2), p. 159.

④ 胡大平:《马克思主义能否通过文化理论走向日常生活?——试析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5页。

和历史的探讨”^①。在这里，历史不在话语之外，而是话语得以存在的条件。

文化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需要厘清。其一是“经济构想”(economic imaginaries)，“被构想的经济在话语上被建构，又在物质上被复制到诸多地点，以不同规模，在不同的时空背景、超越不同时空的视域重新出现”^②。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先诉诸话语，在实践的过程中经受话语的选择、保留和强化，一旦某一经济话语在现实中取得成效，话语本身就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经济构想”引出了第二个重要概念，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 KBE)。在杰索普看来，KBE作为解决福特主义危机的替代方案，其提出和推广是美国霸权主义的一种策略，“KBE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被改变来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以及不同的经济利益”^③，这一经济话语运用的范围越大，美国的统治话语和霸权话语就越得到扩张。在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中，美国通过知识经济这一话语，去说服其他国家接受其中的规则，从而掩盖自己在自由贸易保护下的霸权主义目的。

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论证了话语如何在当代社会发挥建构性作用。话语本身只是一种表象，它需要接受者的解释，在建构过程中也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表面看起来，世界是被话语建构的，实际上，话语仍旧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要对意识形态展开批评，必然要将抽象的话语还原为实在的话语。将话语拉回到物质的维度，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这才是话语理论应该完成的现实任务。

作者简介：

陈文斌，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研究方向为文化政治经济学。

① 岑艾玲、鲍勃·雅索普：《论文化政治经济学中的前学科性和后学科性》，《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第49页。

② Bob Jessop, “Critical Semiotics Analysis and 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04, 1 (2), p. 162.

③ 鲍勃·雅索普：《文化政治经济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国家》，尹树广译，《现代哲学》，2004年第4期，第51页。